

## 編後語

1997年已在經濟繁榮和樂觀期待中來臨，但本刊所關注的是中國知識界動向。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四篇文章，各自從不同角度把中國90年代的思想狀況歸結為「保守主義」或「文化民族主義」。甘陽認為，從理論、歷史、文化、政治和經濟等五個方面看，保守主義話語系統「已成為今日中國知識界的主流」，現在極需認清的是：要「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」？該文剖析近年來盛行的英美式自由主義，並通過清理柏林和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和民主的看法，重申堅持「西方啟蒙以來以及中國『五四』以來的現代性傳統」。徐友漁則指出，在法國大革命和中國「五四」時代、甚至在80年代，守舊和革新兩個陣營涇渭分明；當今的問題卻是：傳統、權威、秩序正由一元變成多元，某種思想初始的動機並不能自動解釋它在當代社會實踐的含義。他把這種狀況稱為文化立場的「錯位」，並強調知識份子應堅持獨立的、批評的立場。陳曉明即批評80年代學風，又把9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的自我反省視為對「文化民族主義」的「無意識構造」，而「90年代知識份子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」，則為「激進的、狹隘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有利的語境」，他主張用「全球化」視野來看待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位置。與上述三篇側重理論闡述的文章不同，張靜勾勒出80年代末「新權威主義」向「新保守主義」的嬗變和種種論說，並審慎評估其學術取向。值得繼續討論的是：「保守主義」是否可以適當地概括90年代思潮？「保守主義」的批評者應在怎樣的理論和歷史參照系中呈現「保守主義」的特徵？又如何處理中國「五四」以來的現代性傳統？

本期陳少明、葛紅兵兩篇短文，為上述討論增添了背景材料。而在「批評與回應」欄中吳國光、徐賁、張寶明就民族主義、「後學」以及文革等問題的回應，同樣展現了90年代中國的學術熱點及問題。此外，劉東清理了前兩年「周作人熱」中的種種議論，提出「五四」之後出現的那種失去儒家制衡的個人主義，正是周作人變節失足的基礎。何懷宏近年潛心研究清代硃卷、八股時文，頗有心得，他在此基礎上談了對科舉制度的看法。柏克萊大學的樹爾門從遍布世界各地的「中國城」來談海外華人「足遍全球、心繫本位」的現象，分析了它的傳統因素和在全球型經濟潮流中的意義。

最後，新年伊始，還要特別向讀者報告兩件事：其一，我們從本期開始將增設不定期的「文革研究」專題，並感謝梁曉燕女士提供數篇有關文革的文章；其二，歡迎蔡韶蘭小姐成為本刊編輯室一員。這都可稱為新年新面貌罷。